

中美贸易冲突、全球价值链重构与国际产能合作

陈斌 程永林 李如坚^①

【摘要】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步入摩擦多发期，经贸关系已从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蜕变为“导火索”。美国政府频繁发起对华贸易争端，使用各种贸易救济工具为国内敏感产业提供保护，采取单边贸易措施提高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要价。面临美国的贸易单边主义政策和全球经济持续性放缓的趋势，如何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如何增强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能力？本文从全球价值链重构视角，基于中国与立陶宛经贸投资合作的经验与证据，探析我国提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产业政策选择与微观基础。研究发现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吸引国内外产业资本和生产要素向本国回流，提高了发达国家对外投资与技术合作的门槛，反而导致发展中国家之间寻求国际产能合作空间大为增加。若“一带一路”价值链整合得到实质性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将可能从嵌入欧美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状态，逐渐转换为互利共赢的高附加值环节的区域价值链形态。

【关键词】中美贸易冲突；区域价值链；国际产能合作；全球经济治理

【作者简介】陈斌，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程永林（通讯作者），博士，博士后，教授，现任职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联系电话 13318728552，电子邮箱 ylcheng@gdufs.edu.cn。李如坚，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硕士生。

The Sino-US trade conflict: Global Value Chain Re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Chen Bin, Cheng Yonglin, and Li Rujian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have entered a period of frequent frictions and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have changed from "ballast stone" (stable) Sino-US relations to "fire" (unstable). The US government frequently launches trade disputes with China, uses various trade relief tools to protect domestic sensitive

^①广发证券分析师魏俊锋对本文写作亦有贡献。本研究是以下项目的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和平效应研究”（14BGJ047）、中国-东盟区域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科研专项和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联合资助项目（CWZD201509）、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级项目“中国参与一带一路金融治理研究：机制、战略与路径”、教育部战略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金融策略研究”（17ZDA01）。

industries and adopts unilateral trade measures to increase the price of Sino-US trade negotiations. Faced with the trend of US unilateralism in trade and the sustained slowdown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key questions are; how to improve China's right to speak and rule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How t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China and the vast number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division of labo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value chain re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dustrial policy choices and micro-foundation of China's ability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and evidence of China-Lithuania economic and trade investment cooper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developed countri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ttrac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industrial capital and production factors to return to their own countries, raising the threshold for foreign investment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On the contrary, the space for seeking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 has greatly increased. I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value chain is substantially promoted, China and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 will gradually transfer from the low-end state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which is embedded in Europe and America, to the regional value chain form of high value-added links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scenarios.

Keywords: Sino-US trade conflict; Regional value chain;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Author: Chen Bin, Ph.D.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Cheng Yongl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Doctor, Postdoctoral, Professor of Guangdong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Li Rujian, Postgradua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Sun Yat-Sen University.

一、中美贸易战对全球价值链和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新挑战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步入摩擦多发期, 经贸关系已从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蜕变为“导火索”。数额巨大且持续扩张的中美贸易顺差, 不断刺激美国政府频繁发起对华贸易争端, 使用各种贸易救济工具为国内敏感产业提供保护, 通过采取单边贸易措施提高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的要价。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和对华战略调整的根源在于不能正视自身综合国力相对衰落、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贡献率不断下降的事实, 不想坐视全球霸权收益受损, 却又无意与中国合作共赢共克时艰。其战略目标在于继续维持全球霸权重塑全球价值链, 战略意图是规锁中国。^①面临美国的贸易单边主义政策和全球经济持续性放缓的趋势, 如何抵制以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继续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构建多边共赢的全球经济治理新机制? 如何提升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领域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 增强

^① 张宇燕, 冯维江: “从‘接触’到‘规锁’: 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 《清华金融评论》, 2018年第7期, 第24-25页。

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能力?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间贸易高速增长,跨国公司规模快速扩大,全球价值链和市场迅速形成,经济全球化现象日益突出。然而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使得“经济全球化”遭受了严重挫折,全球面临需求疲软、成本高升、贸易摩擦增多等多方面的难题,国际贸易陷入增长停滞乃至倒退,这成为“逆全球化”的分界点。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全球进出口贸易额占GDP比重从危机爆发时的2008年的51.86%下降到2015年峰值时的44.99%,下降了6.87个百分点。同期,中国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权重从56.23%下降至36.41%,可以发现我国进出口贸易额的下降幅度远远高于全球均值水平。根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16年我国共遭遇27个国家和地区发起的119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涉案金额143.4亿美元,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同比分别上升了36.8%和76%,中国成为此轮“逆全球化”趋势的最大受害国之一。^①2016年以来,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当选美国总统等一系列黑天鹅的事件发生,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走向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愈加严重。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冲突更是严重冲击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加深了“逆全球化”趋势,这种具有排斥性特征的国际贸易投资和国际营商环境演化趋势,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稳健运行都是十分不利的。

从经济全球化的演进轨迹来看,逆全球化与全球化现象相反相成。当全球化居于主导时,全球多边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会得到迅速推进,国际贸易壁垒和国际投资歧视性政策会逐渐得到纠偏,反之亦然。当前伴随逆全球化趋势的不断推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致力于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 and 全球生产链的再造,试图通过这种并非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布局来改变其国内产业日趋空心化的发展现状。因为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资本-劳工受益程度不同,不同利益集团的受益程度也存在越来越的差异,伴随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国内受损利益集团规模和程度的不断累积,导致他们容易成为逆全球化运动和民粹主义政策选项的倡导者和支持者。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基于理性自利和选民选票考虑,选择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国内,经济代价更小而政治收益更高。所以,在西方所谓的民主选举体制下,执政者要么选择政策对冲来平抑由全球化和一体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矛盾,要么选择改弦易辙迟滞乃至逆转全球化进程,从而形成对于自己更为有利的执政基础。^②

^①海关总署:“逆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中国成最大受害者”,澎湃新闻网,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99512, 上网时间:2019年10月25日。

^②翟东升、宁南山、赵云龙:“欧盟产业发展停滞的结构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8期,第128-159页。

自1978年以来,中国走出了一条进口替代战略为主的工业化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采取出口导向战略为主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低的竞争优势,通过扩大对外贸易、积极引进外资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加入国际分工体系,逐步融入全球价值链。按传统的贸易数据核算,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体、第二大对外投资体、第一大对外承包国世界。虽然中国整体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高,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只能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价值环节嵌入,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研发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作用尤其明显。在全球分工中处于被支配的低端环节,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都陷入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低端锁定”的情况。^①当前伴随中国国内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资源紧张、环境恶化、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等都在从不同方面促使着我国要在全球价值链中不断提升自身地位,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掌握话语权。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正在经历资源重新配置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全球价值链面临新一轮的整合和重构。因此,实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需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和国际产能合作,更深度地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国际经贸规则领域的全球经济治理。

二、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关键在于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当前,以美国为主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加快了再工业化以及对产业空心化的修复进程,吸引国内的产业资本和生产要素向本国回流,从而提高了发达国家对外投资与技术合作门槛,反而使得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内部寻求产业合作的机会大大增加。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发达国家构建高标准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同时也推动了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区域合作,区域贸易合作的兴起加速了全球价值链的分解和重构。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已是必然,而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经济将对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起到非常明显的积极作用。“新常态”对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过高水平“引进来”,借助国内平台环境的建设,利用内需虹吸效应吸引全球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借助一带一路实施大规模“走出去”,依托国内外市场和出口导向战略,在全球广泛配置和就地吸收利用各种先进生产要素和资本。

^①吕越、陈帅、盛斌:“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吗?”,《管理世界》,2018年第8期,第11-129页。

重构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就是一国将本国生产相关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地理上靠近先进厂商分享技术扩散的好处，实现价值链升级。自“走出去”战略提出以来，中国政府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创新发展境外经贸合作区，国际产能合作取得显著成效。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达到1961.5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位，对外投资存量达13573.9亿美元，位居全球第六。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2440亿美元，完成营业额1594亿美元；派出各类劳务人员49.43万人。^①伴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政策的实施，我国的对外经济开放战略和政策正在进行格局性的根本转型。“一带一路”产能合作正在得到实质性推进，中国将很可能逐渐从嵌入欧美日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转换为自我主导的区域价值链（RVC）。现有研究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产业间和产业内的互补性总体上强于竞争性，且中国占据了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具备主导区域价值链的条件。通过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实现价值链转换后，将产生实际贸易利得提高、产业高端化发展等积极影响。^②

国际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有利于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自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以来，中国政府在重要会议上多次强调促进国际产能合作，推动各国优势产能输出。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这也是中国企业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变化趋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一种必然选择。根据我国商务部的相关统计数据，2016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1260.3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51.6%；完成营业额75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47.7%。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上亿美元项目超过2000个，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成效显著。五年来，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累计约7100亿美元，年均增长9%，成为世界主要国际工程承包大国之一。2017年，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6亿美元，同比下降1.2%，占同期总额的12%，较上年提升了3.5个百分点，其中资金主要投向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越南、俄罗斯、阿联酋和柬埔寨等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并购62起，投资额88亿美元，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2017”，商务部官网，<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zhzcj/tzhz/>，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6日。

^② 魏龙、王磊：“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到主导区域价值链——“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可行性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6年第5期，第104-115页。

同比增长32.5%。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1922份,新签合同额477.9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8%,同比下降33.1%。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3万亿美元,其中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额达到10153.37亿美元,占比78.1%。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为9721.12亿美元,同比上涨3.84%,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9.02%。2019年1-8月,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对53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89.7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2.4%。对外承包工程方面,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1个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项目合同3884份,新签合同额777.7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60.1%,同比增长27.5%;完成营业额499.1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54.8%。^①

2019年4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理念。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中指出,中国将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努力实现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六年多来,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7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合作格局基本成型。可见,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中国致力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正在取得显著成效。尤其是2016年以来,伴随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印尼雅万高铁、俄罗斯莫喀高铁、亚吉铁路、肯尼亚蒙内铁路、中欧“三海港区”合作等一批境外铁路、港口重大项目取得积极进展。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大项目取得早期收获,中巴经济走廊两大公路项目、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自由区一期工程项目、印尼雅万高铁、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肯尼亚蒙内铁路等项目顺利实施,尼日利亚阿卡铁路开通运营,亚吉铁路建成通车,马来西亚南部铁路、肯尼亚内罗毕—马拉巴铁路首段工程开工,尼日利亚沿海铁路项目合同一号补充协议签署,土耳其东西高铁、伊朗德玛高铁电气化升级改造、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埃及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收购运营、阿尔及利亚中心港项目等与外方积极磋商并取得有效进展。这不仅带动了产品、中国装备、中国技术、中国标准“走出去”,也有利地提升了产能合作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工业生产的能力,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这表明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达到了互利共赢的效果。立陶宛是中国进入欧洲市场尤其是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jcsjpc.htm>, 上网时间:2019年11月16日。

东欧市场的重要门户，又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国家，下文基于中国-立陶宛经贸投资合作进行案例分析。

三、中国-立陶宛国际产能合作现状与价值链整合演进趋势分析

立陶宛连接独联体和欧盟国家，辐射国际市场能力较强。同时，立陶宛基础设施发达，预期投资回报率较高。目前立陶宛境内公路总里程 88464 公里，有 6 条欧洲级公路经过立陶宛。^①立陶宛铁路总里程达 1877 公里，连接俄罗斯以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交通非常方便。海运基础设施完备，并拥有波罗的海地区唯一的天然不冻港——克莱佩达港。据世界银行数据，2016 年立陶宛航空客运量达 103.83 万人，移动电话用户有 481.40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71.40%，通讯和网络设施日益完善。^②从各项经济指标分析，内需是拉动立陶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尤其是国民消费需求是立陶宛宏观经济保持稳健增长的重要增长点。立陶宛国内制度健全，税率相对简单。主要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房地产税等。根据世界银行《2017 年营商环境报告》中“纳税”这一指标，立陶宛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排名第 27 位。国家经济部将在其下属投资署设立特别工作组，以吸引重大生产项目，并采取配套财政和税收优惠措施，对企业再投资提高免税优惠幅度等。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19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立陶宛在 141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 39 位。在 12 项具体指标中，立陶宛在宏观经济稳定和信息技术利用方面表现优异，分列第 1 和 12 位，^③自宣布独立以来，立陶宛奉行全方位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并在 2015 年成功加入 WTO。开放经济发展模式加上人才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入驻。主权信用评级方面，标准普尔将立陶宛长期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上调为正面，长期及短期信用评级分别维持 A- 及 A-2 不变，国内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受到国际评级机构的肯定。

表 1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对立陶宛的风险评级

评级机构	展望	评级结果	更新时间
标普	正面	A-	2017 年 9 月
穆迪	稳定	A3	2016 年 3 月

^①中国驻立陶宛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立陶宛》，商务部出版社，2016。

^② CIA 数据库网站：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geos/lt.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0 月 25 日。

^③中国驻立陶宛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http://lt.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703/20170302540552.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0 月 25 日。

惠誉	稳定	A-	2016年3月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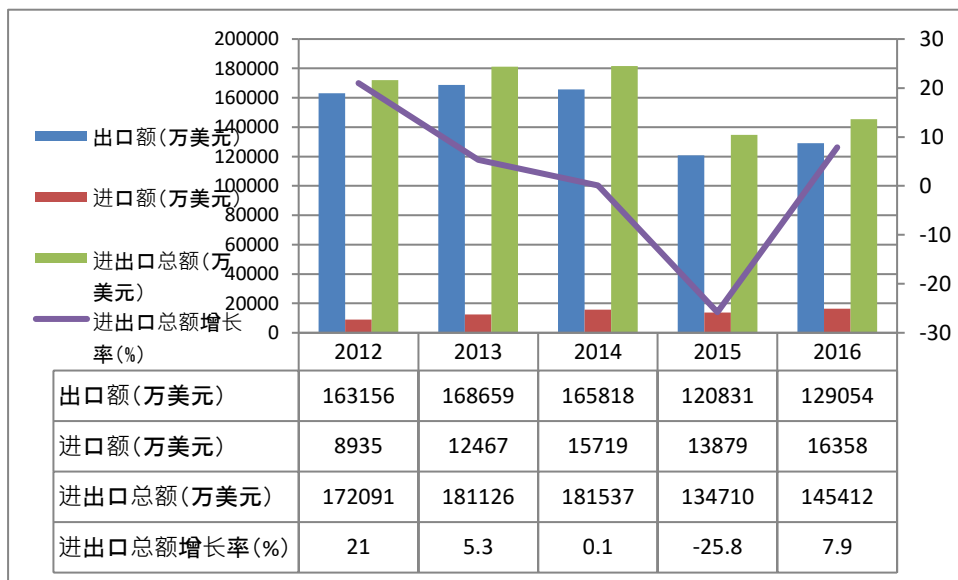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根据各著名评级机构官方网站数据整理。

自1991年9月14日中国立陶宛建交以来，双方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同时经贸合作关系也得到巩固。多年来，立陶宛是中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最大贸易合作伙伴，中国也是立陶宛在亚洲地区的最大贸易合作伙伴。根据我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历年统计数据，2012年以来，双边贸易额度不断增加，中国对立陶宛商品进出口增速保持平稳增长。但是自2015年立陶宛加入WTO之后，当年中国对立陶宛贸易出口额度大幅下滑，2016年以来止跌回升。

1. 中国与立陶宛经贸投资合作进展

自1991年9月14日中国立陶宛建交以来，双方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同时经贸合作关系也得到巩固。多年来，立陶宛是中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最大贸易合作伙伴，中国也是立陶宛在亚洲地区的最大贸易合作伙伴。根据我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历年统计数据，2012年以来，双边贸易额度不断增加，中国对立陶宛商品进出口增速保持平稳增长。但是自2015年立陶宛加入WTO之后，当年中国对立陶宛贸易出口额度大幅下滑，2016年以来又逐步止跌回升。其中2016年双边贸易额为14.5亿美元，同比增长7.7%，其中中方出口额达到12.9亿美元（见图1），同比增长6.6%，进口额为1.6亿美元，同比增长17.9%。

图1 2012-2016年中国对立陶宛进出口贸易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中国海关总署

根据立陶宛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1-8月立陶宛与中国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立陶宛出口中国总额达1.54亿欧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3%。立陶宛进口中国总量

达 6.25 亿欧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①

2. 中国与立陶宛贸易投资结构和产业链合作演进趋势

随着两国未来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双边的投资规模将逐步扩大。据我国商务部的相关统计数据，截至到 2014 年底，立陶宛在我国的投资存量约为 717 万欧元，在其对外海外投资国家排名中位列第 16 名，其中投资的领域和行业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等。与此同时，截至到 2014 年末，中国在立陶宛的直接投资存量约为 1248 万美元，投资领域和行业则主要分布在房地产、机械制造、餐饮、批发零售等领域。中国与立陶宛两国贸易稳步增长的同时，两国之间的贸易结构和产业链整合也在发生新的结构性变化和调整。我国对立陶宛的出口商品结构，除了家具、贱金属等传统产品外，电机、电气、车辆、有机化学品、核反应堆等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正逐年上升。^②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7 年上半年立陶宛对中国进口核反应堆产品同比增长 72.1%。与此同时，我国从立陶宛进口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增长分别为 319%、662.1%。双边的产品贸易结构，表现出较强互补性和多元性。

表 2 2016 年立陶宛对中国进出口商品构成

立陶宛对中国出口主要商品	占比 (%)	立陶宛对中国进口主要商品	占比 (%)
家具、寝具等、灯具和活动房	29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17.8
木及木制品、木炭	23.7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11.6
光学、照相、医疗设备等	10.4	家具、寝具等、灯具、活动房	6.5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5.9	贱金属杂项制品	4.4
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	5	有机化学品	4.3
铜及其制品	4.1	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	4.3
其他植物纤维；纸纱线及其机织物	4	塑料及其制品	4.1
食用水果	2.6	钢铁制品	4.1
其他	15.3	其他	42.9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

四、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立陶宛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和价值链重构的挑战和路

^① 中国驻立陶宛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http://lt.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11/20191102910644.shtml>，上网时间：2019 年 11 月 16 日。

^② 金瑞庭：“立陶宛经济形势研判及推进中立双边经济合作的对策建议”，《中国经贸导刊》，2015 年第 26 期，第 7-8 页。

径

2018 年中美贸易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多项主张对华强硬的政策文件先后出笼。2018 年 1 月 30 日,特朗普在《2018 年度美国国情咨文》中提出,将会重建更有利于美国的公平互利贸易关系和贸易协定,并明确将中国视为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利益、经济 and 价值观的战略对手。2 月 28 日,特朗普政府在提交国会的《2018 贸易政策纲要暨 2017 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国家主导”的政策正在导致全球资源出现“严重错配”,美国将利用一切可用工具,阻止中国乃至其他任何效法中国政策的国家破坏真正的市场竞争。美国政府一方面采取鼓励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本土,另一方面出台新的对外贸易政策增加出口,美国政府可能会持续施压中国开放市场。特朗普政府使用双边协议取代多边协议,并正在持续推动中美贸易谈判并迫使中国做出更大让步。对美贸易摩擦和贸易战的爆发,虽然导致贸易进出口额震荡下行因素长期存在,国际市场需求不振,全球价值链重构等因素导致对美国贸易额度大幅度下滑。当前,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正在由成本优势向技术、品牌、质量、服务、资金等综合优势转换,传统劳动密集型甚至技术密集型产业正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加快转移。

立陶宛是中国进入欧洲市场尤其是东欧市场的重要门户,又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节点国家。立陶宛营商环境良好,营商便利度排名全球第 21 位,而且立陶宛还是波罗的海最大的国家,近年来在吸纳中国直接投资方面也在波罗的海三国中居首位。不仅如此,其国内工业基础也较好,前苏联时代,立陶宛在电子、化工、机械、纺织服装及食品加工等行业已有坚实基础。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双边国际产能合作也伴生着一系列风险和挑战:一是立陶宛受国际因素影响导致宏观政策缺乏连贯性。立陶宛受欧盟和美国的影响较大。随着中国与立陶宛之间经贸合作增多,双方关系的深化已经日益引起欧盟和美国的担忧。一旦美国或欧盟对华政策出现波动,立陶宛作为欧盟成员国,对华政策出现摇摆可能性加大。此外,目前立陶宛能源依赖度已达 75.2%,远远超过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53.2%),所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国际能源市场及其价格波动,势必将严重影响立陶宛宏观经济稳定,^①而宏观经济的波动也将加剧其对外合作政策的不稳定性。二是两国贸易和投资额度仍存在较大不足。立陶宛对中国贸易常年保持逆差,2016 年进出口逆差高达 11.27 亿美元,而且双边进出口贸易结构仍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服务,如计算机及金融服务等发展缓慢,双边

^① 金瑞庭:“立陶宛经济形势研判及推进中立双边经济合作的对策建议”,《中国经贸导刊》,2015 年第 26 期,第 7-8 页。

的开放程度有待提高。双边投资方面则出现较低水平且不平衡，两国之间的投资总量较小，而且近年来立陶宛对我国投资总额逐年较大幅度上升，而我国对立陶宛的直接投资总额则增速缓慢，这些不利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双方顺利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三是中国企业融入立陶宛产业链和价值链需要克服“水土不服”等融入性难题。由于立陶宛与中国国情不一，加上中国企业“走出去”要面对与国内不同的制度环境、法律环境、商业习惯、语言环境等，中国企业在合作时可能会面临产能合作技术标准不统一、商业合同不规范等问题。同时中资企业在立陶宛市场缺乏国际项目运营经验，“走出去”的能力和水平尚待提高。例如普遍缺乏既了解中国国情又深入调研立陶宛，熟悉其语言文化的国际化人才和机构等，因此在进入立陶宛市场时，中资企业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

当前该国在工程技术等领域也表现出色，其中包括与癌症创新治疗及激光科学应用相关的先进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这使得两国进行产能合作具备一系列现实条件。^①中国将为“一带一路”建设新增1140亿欧元投资，用于修建沿线港口、铁路、公路及工业园区网络，中国投资将给立陶宛带来机遇。立陶宛可利用中国的投资来开展立陶宛铁路和克莱佩达港口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等。^②与此同时，立陶宛还可借助与中国的产能合作，将交通物流、激光技术等比较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提高国际竞争力。“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有助于中国加深对立陶宛产能合作，通过贸易出口和对外投资等途径深化双边合作关系，扩大合作领域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1. 国际产能合作政策逐渐完善，国际合作机制逐步深化。2015年5月16日我国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文中规划了2020年的具体发展目标，提及将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作为重点行业分类实施有序推进。2015年以来我国政府先后出台了十几份产能合作政策文件。近年来，从积极签订合作备忘录，到中东欧与中国推动区域合作的16+1模式，再到中国有意参与波罗的海铁路项目等，都说明中国与立陶宛拓展产能合作的政策环境不断得到改善，合作体制与机制日益完善。

2. 国际产能合作互补性高，有利于发挥比较优势。立陶宛和中国虽然都是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国家，但是立陶宛的平均工业化水平指数要高于中国，但是其在基础建设、高端装备

^① 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网站：<http://beltandroad.hktdc.com/sc/insights/lithuania-maritime-link-between-east-and-west>，上网时间：2019年10月25日。

^② 中国驻立陶宛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m/201705/20170502577941.shtml>，上网时间：2019年10月25日。

制造、高新技术等领域仍然缺乏资金和相应的技术支持,因而对外合作需求强烈。而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我国在铁路、公路、港口、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等方面,拥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而且中国具有庞大的资金量,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1961.5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再比如在农产品合作方面,立陶宛国内农业资源丰富,这使其农产品出口具有比较优势。与之相比,中国农产品由于面临国内自然环境和人口约束压力,这使得中立两国在农业产能合作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3. **双边贸易潜力大,价值链契合度较高,符合双方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两国之间的贸易拓展潜力可以用贸易结合度和贸易互补关系来测量,而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密切程度可以用贸易结合度指数(TII)加以衡量,大于1表示贸易联系紧密,小于1则为松散。根据《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6)》,中国与立陶宛的出口贸易联系比较紧密,以产业贸易为主。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对立陶宛出口的主要化学成品及有关成品的出口贸易度较高,烃类及衍生物甚至高达6.609(见表3)。2015年立陶宛对中国出口的产品互补强度指数接近1,其中互补强度最大的产品是煤砖、褐煤及泥煤。立陶宛对中国进口的产品互补强度约为0.8,互补度最大的是纺织品原料,而这些产品正好是中国可以合作的优势产能。而且中国对立陶宛出口前十的产品重合度较小,仅为10%。立陶宛的生物技术、激光技术是其优势产业,两国之间进行相关领域的产能合作,耦合度高。例如,立陶宛研发实力雄厚,在生物科学、激光技术等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深圳也有华大基因、大族激光等领军企业,双方合作契合度很高。^①开展产能合作,加速中国装备制造业“走出去”,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既符合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也满足立陶宛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诉求。

表3 2015年中国对立陶宛贸易结合度前十的产品

	产品种类	贸易结合度指数		产品种类	贸易结合度指数
对 立 陶 宛	烃类及衍生物	6.609	从 立 陶 宛	其他未加工的矿产	2.598
	生铁	5.863		家具及零件	1.800
	有机-无机化合物	4.723		化肥、原油	1.444
	纸厂及纸浆厂机械	4.167		其他有机化学品	1.166
	氮基化合物	3.814		机械搬运设备	1.104

^① 深圳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

网站: http://www.sz.gov.cn/wsbgs/xxgkml/ztlm/sldwshd/201601/t20160122_3453187.htm, 上网时

间: 2019年10月25日。

进 口	滚柱轴承	2.957	进 口	动力发动机机械及其零件	1.030
	汽车零件及附件	2.131		有机-无机化合物	0.985
	合成、回收的废旧橡胶	1.878		照明器材	0.975
	机械传动设备	1.838		有色金属废料	0.457
	艺术品、收藏品及古董	1.654		木制成品	0.382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6）》^①

五、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深化“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和价值链重构的政策建议

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只能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价值环节嵌入，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都陷入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低端锁定”的情况。实现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需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的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和国际产能合作，更深度地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国际经贸规则领域的全球经济治理。本文从全球价值链重构视角，基于中国与立陶宛经贸投资合作的经验与证据，探析我国参与重构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投资政策选择与微观基础。研究发现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加快了再工业化进程，吸引国内外产业资本和生产要素向本国回流，从而提高了发达国家对外投资与技术合作的门槛，反而导致发展中国家之间寻求国际产能合作机会和空间大为增加。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能合作的互补性总体上大于竞争性，若“一带一路”价值链整合得到实质性推进，中国将很可能逐渐从嵌入欧美日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状态，逐渐转换为不断提升和主导高附加值环节的区域价值链形态。因此，要抓住“一带一路”以及国际产能合作的历史性机遇，防范来自国际和国内的风险，深化两国产能合作，实现双赢局面。因此，我们建议：

1. **以政府合作为引导，完善双边国际产能合作政策支持体系。**通过推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升双边领导人会晤和首脑外交成效，通过达成合作共识，减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家联盟的对华政策摇摆。通过签订双边或者多边产能合作文件，例如签署国际（双边或多边）产能合作备忘录，尽快出台一系列相关指导意见，为产能合作提供合作思路、合作对象、产能选择的重要指导。通过强化政策保障，签订相关协议、协定等并且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和服务，做好政策支持和服务咨询工作。通过制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能

^① 张其仔等：《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合作需求图和产能合作时间推进表,可以为中资企业的涉外投资决策提供帮助。建议我国商务部、发改委、外交部与立陶宛对应政府机构部门通过构建多边或双边合作机制、研究产业合作领域、举办专题论坛等措施,积极引导和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2. 提高中资企业跨国经营能力,形成区域产业链和价值链合作模式。市场主体是企业,因此在选择合作路径时,要重点关注我国已经“走出去”的企业。在政府推动下,中国企业应该结合自身优势,提高自身实力。具体而言,中资企业首先应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在进入“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前做好准备工作,合理评估当地的需求与风险,增强抗风险能力。进入该市场后应该遵守东道国的商业规则和国际惯例,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其次,国有和民营企业要发挥自身优势,合理配置资源。由于国际产能合作领域现阶段主要集中在基础建设、装备制造业等领域,所以主要还是以大型国有企业为领军企业,中小民营企业可以借船出海,与国企形成产业链,拓展并做大做强市场。

3. 科学规划国际产能合作领域,建立风险评估与风险预警系统。建议组织智库专家和学者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能开展的国际产能合作领域、前景、机制等问题展开深入调查研究,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产业发展层次、国内资源集聚程度、产业合作需求等问题展开跟踪研究,科学规划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国际产能合作领域和层次。与此同时,我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外事、商务、国资委、发改委等职能部门,需要引导企业、智库、高校研究机构对东道国营商环境开展跟踪研究,尤其要注意发挥中资企业的功能,借助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在立陶宛设立监事办公室,注重对当地经济信息情况的收集和汇总,保证信息渠道的畅通和信息的应用,逐步建成权威性的投资贸易与产能合作风险预警系统。^①对中国政府和企业面临的风险进行实时监控,并将相应信息反馈到动态风险监管体系中,不断提升我国政府部门、涉外投资企业和民众应对风险的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

4. 破除合作瓶颈,构建国际产能对接机制与区域价值链体系。中国可以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双边或多边贸易投资,优化贸易结构,尤其是对于高附加值的商品贸易应加强合作,例如对于某些限制门槛高的服务贸易可以降低门槛。以产品输出的产能合作方式,通过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规划,了解其产业发展需求,精准输出中国优质的富余产能,以契合东道国的产业基础建设和发展需求,同时有利于中国的产业转移和转型升级。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很大,而我国

^①程永林. 海丝谋划、风险评估与监管监控,《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59-66页。

很多制造业、基础设施装备和产能质优价廉,综合配套能力强,然而制约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瓶颈制约因素之一是资金和融资问题。为此,需要通过亚投行、世界银行和PPP融资模式等相互结合的投融资合作机制,满足大量的资金需求。还可以通过建立合作基金,例如中拉合作基金形式或者借助已有的大型金融机构,例如借助亚投行以提供产能合作资金保障。可以尝试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产业园区、经济特区,形成产业集聚效应,降低运营成本,便于吸引外商投资。因此,未来应注重培育中国企业进一步做强做大,要以产品输出型模式转变为产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重模式,同时以资本输出来带动产能输出,通过工程承包、装备制造出口、对外投资等上下游产业集群合作方式,重点推动我国产品、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逐步建立以我为主的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体系。